

惜，可是理性與感性要能平衡，才可以有美學修養來處理生命中常常出現的兩難，這種兩難成為一種對知識份子美學修養的考驗，這美學修養是知識份子追求知識的起點，也同樣是終極關懷。我們共同希望，這個社會上的知識份子，能找回美學修養，它不僅是對音樂美術的喜愛，同時要把美學修養變成情感性的、對待人的態度，也就是一種關照與尊重，它同時具備了情感的敏銳度，和理性的節制，我覺得情感的豐沛是很重要的，如果沒有了情，理性只是乾枯的僵化教條而已，要知道什麼是愛、關心、牽掛、眷戀，然後理性發生作用，把情感處理得好，處理得當，生命才圓滿。

3 | 知識份子十二講

商業社會中士人精神的再造

余英時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香港新亞學院畢業、燕京大學肄業。曾任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密西根大學副教授、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香港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普林斯頓大學校聘講座教授等職。



從「耕讀世家」到「棄儒就賈」

這一系列的演講名為「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其實知識份子就是傳統所稱的「士人」。然而，我今天所要演講的，仍然偏重於知識份子的範圍，因為從古代的士人到現代的知識份子有著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士」是一種流品，為某一類人。而所謂「士農工商」的四民概念亦普遍存在。過去中國有一種觀念叫做「耕讀世家」；也就是農人與士人常常出生於同一家，如曾國藩即是在普通農家出生。「士」是到了明代以後起了變化；有些一輩子唸了許多書的士人，不一定能夠考上秀才或中了舉人，但他們依然具備知識水準，因此轉而成為官府的幕僚，或是教書的先生，或是從商。因此，我認為在十六世紀，明朝末年，一直到外國勢力侵入中國以前，社會結構已經悄然改變。在社會之中，「士」和「商」變得難以分別。正如同十九世紀的人觀察到：過去我們以為「士」為四民之首，「商」為四民之末，而今不然。現在有錢的人才能送孩子去讀書，而錢財又常常是商業家庭才能提供的。所

以常常士人出生於商人家庭。這種現象，在歷史上稱為「棄儒就賈」。因此，當時代改變，商人慢慢受到尊敬，社會地位上升。

此外，從唐伯虎、鄭板橋賣畫或如乾嘉大師和商人聯姻等故事中都不難發現，「士商合流」是十六至十八世紀中國社會史上的新趨勢。西方不少大企業家，專門收藏有名的古董與畫作，並且在死後不收分文地捐贈給博物館，因此成為藝術。明清大富商也用他們的財富支持文化和藝術的發展，如編印叢書、收買名家書畫等。揚州畫派、新安畫派也是靠鹽商支持起來的，園林藝術更與揚州鹽商有關。傳統的偏見說他們「附庸風雅」，其實是他們扶持了「風雅」。

一九八五年的轉捩點

方才提到「士人」轉變而成「知識份子」，最重要的時期在清末，以科舉廢止為分水嶺。中國社會向來重視士大夫教育，而對於男兒當兵有著嚴重的輕視。但從某一方面來看，中國人選擇賢才的重點在於「知識」，這在世界上是獨一無

二的。理論上，大家總覺得讀書人明白道理，不偏不倚，非為某一特殊利益而存在。商人則彷彿為了爭財奪利而存在。因此一直到宋初，商人及其子弟都不能當官。當官好像祇應該是讀書人的事。這在古代中國也有其道理，但越到後來，便越不能維持這個辦法，商人也有了入仕的途徑。科舉的名額不會隨時間而增多，人口卻會慢慢地增加，因此，士人漸漸有了外流的現象，走入商人社群。最後，士大夫的精神也跟著慢慢流傳到商人的階層去，商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愈往後愈重要。

一般人認為，商紳合流的觀念是受了西方入侵的影響；事實上，在十八世紀就已經有「紳商」名稱出現在官方的碑文上。在十六世紀日本倭寇大舉侵犯大陸時，江陰便有大商人修牆護城，除了是一種社會參與之外，也可以間接得知他們已然是新興的社會集團。

當然，我們無法確知何時士人忽然轉變成為知識份子，但一九〇五年廢除科舉制度絕對是一個關鍵。在傳統時代，透過科舉，可以保證讀書人有一條到達權力中心的路，但之後不再有了。所以我覺得「科舉制度」與「士人」是不可分

的。如今新的知識份子和舊時代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從以下的例子可以看得出來：在割讓台灣那年，康有為「公車上書」，參與的都是當時在北京參加會試的舉人，那是彼時一種士大夫的群眾運動。他們感覺到不能把中國的土地割讓給日本，因此大聲疾呼。我們可以說，清代士人的政治覺醒是以一八九五年為重要的轉捩點。在那以前，不曾有過一個群體性的意識。所以，許多革命或改革都是從那時候開始的。但是「公車上書」仍是士大夫的運動，和南宋太學生愛國運動一脈相傳，不過波瀾更壯闊而已。

到了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中國社會才有第一次現代知識份子的社會運動。他們四處尋求工商界的合作，因此有罷市罷工的狀況發生。此外，學生們更是積極地走上街頭。一般的群眾很容易便可以看出來一八九五年和一九一九年兩次運動的差異。這其間，不過是相差三十多年，傳統士大夫已經蛻變成爲知識份子。因為，傳統士大夫會向政府請願，知識份子則轉而向社會訴求。

你是知識份子嗎？

台灣在這幾十年來和大陸有一個很大的分野，即知識份子總是扮演著自己應當有的角色，並且本著良知說話。不過慢慢地，大陸會漸漸接近台灣腳步。我想，從長遠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歷史與國家大勢，應該還是很樂觀的。「五四」以來追求民主、自由、人權的理想逐漸在實現，先是在自由中國的台灣，現在已傳佈在中國大陸上了。這是大陸上知識份子和老百姓的共同覺醒，不可能永遠被鎮壓下去的。

在我的講題中提到了「商業社會」，西方稱之為「資本主義社會」，今天流行的名稱是「市場經濟」，一切以「競爭」為主軸，但或許這兩種說法都不夠周全。競爭從原來的「市場」傳到各個社會層面，政治上競爭產生了民主系統，知識思想上競爭帶來了學術自由。西方人今天已常用「觀念的市場」(market of ideas)這個名詞了。其結果是「多元社會」的出現。

在多元化社會之中，誰都可以是知識份子，誰也都不是知識份子。不是有知

識的人就是知識份子。比如有些終身關在研究室中做研究的學者，他在知識和專業領域中到達一個很高的水平，但他並沒有社會的參與。當然，他有權選擇這樣做，這是每個人價值觀不同的問題。但專門學者、科學家如果不參與社會事務，我們便不好說他們是「公共知識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今天的「知識份子」必須是關心並參與「公共事務」的人。

然而，在每個人的分工以外，其實還有一個共同的領域，攸關著每一個人的利益，我們稱它為「公領域」。比如最近你可能會特別關心「柯江會談」的問題，想知道這樣一個國際情勢所帶來的影響。因此，我們也可以稱這樣的一種參與為「公民意識」，那是存在每一個人的私生活之外的。就像綠黨重視環境保護；就像長江三峽工程只是毛澤東偶然詩句中的浪漫想像，但施工之後，卻可能帶來無法預知的後果。因為科技在便利之餘，確實也有其可怕的副作用。我想，人本身就是自然，又怎麼能妄想征服自然呢？這就好比西方神學上的難題：如果是上帝創造的，那麼人怎麼能有反抗上帝的自由意志？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當社會漸趨多元之後，每個人都為了自己所心儀的價值護衛。「發展科技以增加人的福利」是價值，「保護大自然」使後代有一個良好的生存環境也是一種價值，卻可能難以兩全其美。這就像中國傳統裡面所說的「忠孝不能兩全」，並非是其中一方不好，而是價值本身就是衝突的。又比如法國大革命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可是「自由」和「平等」之間便存在著潛伏的衝突。這也是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由來已久的爭執。我並非意指社會主義不好，它對於平等的概念有其重要性與貢獻。而自由市場固然好，卻又常常容易形成貧富不均的下場。

由此可知，沒有一個知識份子能代表所有的價值。
過份的執著就會造成悲劇的誕生。

多元社會中的動態平衡

自由主義有一個新名詞叫做「分配的公平」。這也就是在西方福利制度中，希望連最貧窮的人也可以得到最起碼的生活保障。而大陸上的困難之處就在於沒

有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最早他們是從出生到死都由政府包辦，連反對政府的異議份子亦然。而那些異議者拿了錢又寫文章或拍電影去反抗政府。但今天大陸上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已無力再包辦下去，可是失業下崗的人怎麼辦？轉型的困難是不可想像的，俄國便是眼前的例子。可見最初採用極權政府，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是一致命的錯誤。今天一開始改變，便遇到了分配不公平的大危機。

其實，在愈民主的社會，政治的比重就愈輕。就好比中國古代有一個理想：帝力予我何有哉？農民們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靠外力。換句話說，國家和政府只是為了要維持一個良好的共同領域而存在，因此必須隨時受人民的監視和督察，這只有民主才行。如果政府無法維護人民的利益，又不許人民表達反對的意見，必須動用武力，就本末倒置。正如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所提到的一樣，人民才是真正的主人，卻什麼事都不能做。傳統中國君主的權力過份擴大，最後便成了一個專制社會。在民主社會中，你可以生活在政治之外，依舊受到法律的保障。可是專制社會不然，你不管政治，政治卻會管你。專制或極權政治必然是一元的，思想必求定於一尊，社會和文化都不能活潑暢發，弄成

死沉沉的局面。

在民主社會中，知識份子在不同的領域，所扮演的角色就會不一樣。以今天台灣來說，價值多元，社會不斷變動，這是自然的現象。比如在這一系列的演講之中，可能每個人的政治思想都不一樣，但每一講者都能有完全陳述其觀點的自由，這便是多元的明證。如果我們要保持表面的「和諧」、「安定」，不許講者有不同的意見，那便成為一元化的極權社會了。我們的領域各不相同，價值考慮不一致，只能提出不同的看法，讓聽眾自由選擇。這是「思想的自由市場」，決不可能祇有一種聲音。知識份子在今天必然是多元化的。

人不是上帝，不可能有全面的透視力。因此我們只希望不同領域、不同觀點的知識份子，各就專業知識和公共關懷，提出不同意見，維護不同甚至彼此衝突的價值。在不斷的爭辯中，逐漸取得價值的動態平衡。我們決不可再以「和諧」、「穩定」為藉口，希望思想上能定於一尊。

中國傳統社會到了宋明以後，已出現思想的多元分化，可是我們的思想整體取向依然是一元模式。「和諧」、「穩定」是我們的最高價值，因此掩蓋和壓制

了新觀念的成長。這一傾向在過去五十年大陸上又因極權體制的強大力量而加強了。知識份子因此不能發揮他們應有的作用。台灣則已從這個一元模型中破壁而出，但有時也不免積習未除盡。所以我願再強調知識份子多元化的重要性。

我又強調：在今天多元化社會中，知識份子已不屬於任何一個特殊階層。我們必須擴大「公共知識份子」的概念，使它可以包括一切有公民意識、參與公共事務的意願的個人。這可以打破知識份子高高在上的錯誤觀念。中國現代知識份子從「士」階層轉變而來，而「士」一向被視為「四民之首」，所以中國知識份子特別不容易擺脫「菁英論」(elitism)的陰影。在自由中國的台灣，已無人不受教育，因此人人都有機會扮演「公共知識份子」的角色。大陸上另當別論，那裡據說還有三億以上的文盲。如果人人都可以是知識份子，那麼我們更必須準備隨時聽到許多嘈雜的聲音。

只有自己能再造自己

我想，今天講題中的「士人精神」，其實應該就是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感與公民意識。只要自己有自覺，關心社會國家、重新體會即可。「再造」即存在於這一自覺之中，因為沒有人能再造你，只有自己能夠再造自己。傳統型「士人」變成現代公共知識份子便是自我轉化的結果。題目中「商業社會」也必須擴大其涵義，指不同領域的「市場」，但以「自由競爭」而論，其原始起點則是經濟市場。不過大家不能誤會，以為我主張一切「商業化」。「商」字有商量、協商之義，比較合乎民主、平等、自由的現代精神。

「士」的傳統在中國是特殊的。他結合了道德和政治的雙重身份。但是在西方，教會所代表的是社會良心，又加上有完善的組織，因而能與王權抗衡。比如清教徒就有著極大的力量，代表上帝發言。事實上，他們所說的話大多是與中國儒家士大夫相似的，是為民請命的，對社會現況不滿的聲音。雖然它表面上聽起來是宗教語言，內裡卻包含著許多政治意味，涉及社會抗議和社會批評。但中國

儒家不是有組織的宗教，它依附在政治社會體制上，沒有自己的獨立組織。到了現代，它更只能存在於每一個知識份子的身上，很容易為政治暴力各個擊破，這是一大難題。

所以，在西方有透過組織所散發出來的團隊力量，在中國卻只能依靠許多不同的個人道德修養。這有好有壞，好處是比較自由，壞處則在於缺乏力量，而且個人隨時可能改變心意，從反抗暴政變為擁抱暴政，只在一念之間。此外，也較容易因為沒有組織的運作，因而沒有人可以檢查你到底合不合格？不同於西方教徒必須嚴格遵守教會規條，在中國，極可能是為利為益的人卻假裝成天理，這也是我們長久以來傳統上的負擔。不過，如明朝東林黨為了正義，寧死不屈的抗議精神，則顯得少而珍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早已指出中國道德觀念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關於「私德」的，關於「公德」的極少極少。「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成為中國人的處世格言。孫中山說中國人是「一片散沙」也是此意。這仍是中國知識份子如何自我「再造」中的一大課題。

結論與期許

在我的感覺之中，傳統的「士」已經沒有了。所謂的「知識份子」已經慢慢邊緣化了。共產黨說「臭老九靠邊站」，其實能「靠邊站」大概還算是幸運的。在其統治之下，知識份子被迫害致死的人數根本難以估計。今年是他們「反右」的第四十年。在美國或者台灣，被人指為「左派」或「右派」並沒有很大的影響，但是在大陸上卻有可怕的社會後果。「左派」可以長期享受一切「革命特權」，一旦被定為「右派」，則成黑五類之一，便是鬥爭侮辱的對象，家破人亡是必然的結局。

因此，在共產黨裡最後能站起來的都不是知識份子。從最早的陳獨秀所遭受的下場便可知其端倪。在中共黨史上，知識份子走的是一條不斷邊緣化的道路，而真正掌握實權的則是一些原來在舊社會上屬於邊緣的人物。如毛澤東即一典型邊緣分子。儘管他書唸得很多，但他有另外的想法，便是如何在中國史書和小說中去尋找「整」知識份子的知識。最後的結果是，只有這種人才能在共產黨裡得勢。

大陸上知識份子前三十年是在毛澤東刻意迫害、侮辱、鎮壓下渡過，最近一、二十年又在黨內鬥爭和「商業潮」下備受衝擊。但大陸至今仍不是一個正常的「商業社會」。近十年來，中共的首領和子女們正在用權力換取市場利益，把黨控制的公共資產化為個別幹部的私人財富。大陸仍無法律可言，正規的商人是不可能與這些「紅色資本家」競爭的。知識份子的公共空間仍然少得可憐。這種情況對於海峽彼岸的安全是一極大的威脅。台灣的知識份子幾乎完全不懂中共的歷史及其演變的現狀。中共的政治制度還是絕對一元化的，知識份子雖有多元化的要求，但隨時可以被扼殺。一般台灣知識份子因為看到大陸思想控制已不及從前嚴厲，以為大陸知識份子已和自己無大分別，因此對中共本身也不免掉以輕心，他們甚至已不關心大陸異議知識份子的命運。「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態度在不少台灣知識份子的身上都不難發現。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台灣知識份子的政治判斷力尚有改進的餘地。

資訊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程度，好像我們閉門在家真可以知道天下事了。從這一方面看，作一個知識份子在今天似乎已經很容易了。但資訊愈是爆炸，愈是需要判斷的能力，否則即將淹沒在資訊的海洋之中。有些人以為擁有電腦就算萬事具備了，卻忽略了：電腦可以給你資訊，但不能給你判斷事情的能力。

我們作為現代人，要有公民意識、社會參與，每一個人也都必須試著扮演知識份子的角色，即使只是在生活中某一短暫的片段時刻。但是，正如西方一位女哲學家阿倫德（Hannah Arendt）所說，我們這個時代，由於太重視行動，卻成了一個不思不想的時代。「不思不想」正是缺乏判斷力的最大根源。沒有判斷力，一切「公民意識」、「社會參與」都變作了隨波逐流，依人腳跟而轉；只有形式，而無內容。所以，我最後一句話是：知識份子的「再造」必自培養深刻的判斷力始。